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



史家行迹 与史书构造

——以魏晋南北朝佚史为中心的考察

唐燮军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C14030253

K092.35
02



史家行迹 与史书构造

——以魏晋南北朝佚史为中心的考察

唐燮军 著



北航

C1717130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K092.35

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家行迹与史书构造:以魏晋南北朝佚史为中心的
考察 / 唐燮军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308-12436-2

I. ①史… II. ①唐… III. ①史学史—研究—中国—
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K092. 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5651 号

史家行迹与史书构造

——以魏晋南北朝佚史为中心的考察

唐燮军 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封面设计 木 夕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57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436-2

定 价 6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北航

C1717130

目 录

引论:近百年来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述评	(1)
第一章 符瑞、时政与韦昭《洞纪》	(16)
第一节 韦昭生平及其个性缺陷	(17)
第二节 《洞纪》性质及其学术渊源	(20)
第三节 《洞纪》的写作背景及其著述旨趣	(24)
第二章 国家认同、国史重构与张勃《吴录》的边缘化	(30)
第一节 张勃的国家认同:以家学门风之传承为重心的推考	(31)
第二节 否定之否定的必然:由《吴书》而《吴志》至《吴录》	(39)
第三节 颠覆与超越:《吴录》对孙吴国史的重构	(51)
第四节 合理的异常:政治变迁、正统之争与《吴录》的边缘化	(59)
第三章 族势、行迹与虞预《晋书》	(66)
第一节 族势升降与虞预的立身行事	(67)
第二节 虞预治学重心转移的社会基础	(70)
第三节 虞预《晋书》若干疑义辨析	(74)

第四章 政情异动、文化管控与南朝前期刘宋国史的编纂热潮

..... (81)

第一节 宋孝武帝的政治需要与徐爰《宋书》的相应构造

..... (81)

第二节 刘祥《宋书》与南齐官方修史重心的转移 (88)

第三节 文化管控下沈约《宋书》对刘宋始末的历史书写

..... (95)

第四节 余论 (99)

第五章 误读与曲解:沈约《宋书》平议 (103)

第一节 辨沈《书》与何、徐旧作之关系及其八志断限诸问题

..... (103)

第二节 考沈《书》、裴《略》之关联及其在梁代地位之变迁

..... (113)

第三节 论沈《书》之尚变及其史学影响 (122)

第六章 借史明理的裴子野及其以义绳事的《宋略》 (129)

第一节 《宋略》的成书时间 (130)

第二节 史料来源与编纂体裁 (134)

第三节 裴氏史论的义理化倾向及其《雕虫论》的作旨 (140)

第四节 《宋略》的流布与散佚 (143)

第七章 史家游记与北魏别史:《洛阳伽蓝记》商兑 (148)

第一节 作者生平及其著述宗旨 (148)

第二节 文注分列的编纂体例及其渊源 (151)

第三节 学术声誉的变迁及其原因 (157)

第八章 生前行迹、国家认同与何之元《梁典》 (165)

第一节 何氏行踪与《梁典》构造及书法之关联 (166)

第二节 《梁典》佚文及其作年考 (171)

第三节 编纂体裁与著述宗旨辨析 (175)

第九章 经世意识与魏晋南北朝史体优劣论

——兼论刘知幾的“二体并行论” (179)

第一节 干宝对编年体的倡议、改良及其史学影响 (180)

第二节 范晔与纪传史的复兴	(185)
第三节 何之元的史体观及其历史意义	(188)
第四节 刘子玄“二体并行论”的偏失及其成因	(192)
附录 1 论《建康实录》对韦昭《吴书》的引用	(196)
附录 2 淑世情怀与沈约治学重心的转移	(202)
附录 3 《宋略》辑佚与校证	(225)
附录 4 《隋书·天文志·五代灾变应》勘误	(330)
参考文献	(336)
索 引	(349)
后 记	(354)

引论：近百年来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述评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魏晋南北朝^①史学史研究的回顾和总结,在海峡两岸学界时或可闻,杜维运的《近六十年之中国史学史研究》^②,乔治忠等人编著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③,张荣芳的《民国以来的中国中古史学史研究》^④,董文武的《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述评》^⑤,杨惠如的

① 此所谓魏晋南北朝,上起献帝建安元年(196)曹操掌控东汉朝政之始,下迄恭帝义宁二年(618)隋祚告终。此种断限尽管与当下学界的一般理解有所差别,却更符合胪叙三国史事必溯至汉末(例如《三国志》)、隋代被归入北朝一系(例如《北史》)的传统措置。而且事实上,唐人刘知幾在撰述《史通》时,亦尝将汉末至杨隋之际的史学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统称为“近古之史”。

② 杜维运:《近六十年之中国史学史研究》,载氏著《听涛集》,台湾弘文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73—286 页。

③ 乔治忠、姜胜利:《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2—115 页。

④ 张荣芳:《民国以来的中国中古史学史研究》,《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四届讨论会》第 1 册,台湾“国史馆”1998 年版,第 593—607 页。张氏所谓的“中古史学”,主要着眼于皇朝兴衰,而以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为断限。

⑤ 董文武:《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述评》,《高校社科信息》2001 年第 5 期,第 1—7 页。

《1950年以来两岸三地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的研究》^①,胡逢祥、李远涛合写的《五十年来中国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②,以及瞿林东所作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③,即其荦荦大者。相比较而言,大陆学者盖因政治对峙、文化隔绝而难以觅取台湾学人的相应论著,故其评述多限于大陆学界;而台湾学者既得益于相对开放的文化氛围和多元化的资讯交流管道,同时又颇受大陆学界所出《三国志》《宋书》等古籍点校本之沾溉而不免爱屋及乌,因而多能兼顾并重两岸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尽管如此,台湾学者的此类反思,既不曾全面爬梳已有的相关论著,更未能贯彻“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检讨包括大家名作在内的所有研究成果^④。是以不揣浅陋,拟在参酌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地评述已有论著的优劣长短,进而在纵向考察此项研究百年历程的同时,横向比较20世纪50年代以降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在海峡两岸学界的分途发展。

就较为宽泛的角度而言,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探究,至少可以追溯到《文心雕龙·史传篇》的下段评述:

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至于晋代之书,系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

① 杨惠如:《1950年以来两岸三地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的研究》,台湾《景女学报》第2期(2002年1月),第85—106页。由于在香港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的学者,大多来自台湾(例如逯耀东)或最终定居于台湾(譬如钱穆),故该文虽以“两岸三地”为讨论范围,实仅台湾、大陆两地而已。

② 胡逢祥、李远涛:《五十年来中国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第149—154页。

③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上下),《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3期,第201—213、266页,第347—357页。

④ 卢建荣先生近年来所作的部分论著,例如《金权本色:台湾史学帝疆争雄记》(新高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2年版),对台湾史学界虽多所批评且不乏亮点,但卢先生的怨妇心态,决定了此类批评苛刻有余而深度不足。

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州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降及中唐，复有刘知幾《史通》，在承继刘勰旧说的基础上扬榷史籍、探究史理，对“近古之史”做了更全面的论述。^① 尽管如此，晚近以来的学界主流仍倾向于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视为此项研究的起点。^② 平心而论，这一主张虽然在事实上割裂了新学与旧史之间的内在关联^③，甚至不能排除贬古媚近的嫌疑，却也未尝不可成立；毕竟自从清季民初传统史学转型为“新史学”后，至少在著述形式和研究范式上，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差异。^④

生值“学问饥荒”之世而欲缔造“不中不西即中即西”^⑤之新学派的梁启超先生，既深受乃师康有为经今文学之熏陶，又颇受西方史学尤其是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所合著的《史学原论》之启发^⑥，而运以别识心裁，遂能融贯中西，撰就近十万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进而揭橥“史学史的做法”：

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⑦

① 傅振伦：《刘彦和之史学》，《学文月刊》第 1 卷第 5 期（1932 年），第 26—34 页。

② 例如刘显叔先生，既谓“我国新史学的兴起是在民国二十年以后”，又称新史学“是以严密的史料学为基础而发育成长的，揭橥的原则是纯就史料以探史实”。详参其《近六十年来国人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台湾《史学汇刊》第 4 期（1971 年），第 189 页。

③ 对传统史学的掎击乃至丑诋，在清季民初蔚为潮流，严复对循环论的批判，黄遵宪对以天朝为中心的历史观的驳斥，徐仁铸对“正史”乃十七姓之家谱的指责，只是其中的典型实例而已。详参黄俊杰《民国四十年至民国六十年之间国内史学思潮的激荡——以研究方法论为中心》，台湾《史学评论》第 6 期，华世出版社 1982 年 9 月，第 181—182 页。

④ 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 6 期（1997 年），第 262—284 页。

⑤ 《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九《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梁启超原著，朱维铮校注，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146 页。

⑥ 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载前揭《听涛集》，第 193—206 页。

⑦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三第四章之丑“史学史的做法”，《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7 页。

梁氏作为“新史学”的倡导者和以新体书写历史的“第一人”^①，尽管其治学风格确实存在着“未精未纯”^②之不足，且其诸如“晋代玄学之外惟有史学，而我国史学界亦以晋为全盛时代”^③之类的相关论断，也颇待商榷^④，但这位“思想界之陈涉”^⑤，对中国学术史的真正意义，主要表现为在除旧的同时别开新路^⑥，进而奠定了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的基础。

也就在梁任公直接启发或间接影响下，渐有学者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甚而不乏以梁氏构想为框架而撰述的中国史学史专著，例如梁门弟子姚名达，就曾依乃师所示而撰就《中国史学史》一书，此则其所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按语言之甚明：

民国十四年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著《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述，至今二年，积稿颇富，惟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⑦

又如金毓黼所著的《中国史学史》，无论历史分期抑或篇章结构，皆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论，亦以梁氏设想为准的：

金毓黼的书，是在梁启超设计的蓝图上写出来的。这书在分期问题上，也大致是按着梁启超所说的办法。梁启超对于分期说得不

① 罗炳绵：《梁启超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创新》，载陶希圣主编的《清代学术论集》，台湾食货出版社1978年版，第586页。

②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第16页。

④ 例如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就曾对其“我国史学界亦以晋为全盛时代”之说表示异议，转而主张“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详参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页。

⑤ 林志钧：《饮冰室合集序》，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页。对此，周予同论曰：“就全部思想界说，梁氏是否是‘陈涉’，尚有商榷的余地；但就四十年前的史学界说，梁氏却确是揭竿而起，登高而呼的草莽英雄陈涉呢！”详参其《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可见杜维运、陈锦忠所编的《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三）》，台湾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第395页。

⑥ 梁氏本人亦尝宣称：“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详参前揭《清代学术概论》四《顾炎武与清学的“黎明运动”》，第15页。

⑦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姚名达按语，可见前揭《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97页。

清楚,金的书在分期的概念上也不显明。梁启超主张史学史要写史官、史家、史学,金的书也就按照这三个部分去写。梁启超推重司马迁和班固,金氏书把司马迁和班固列为专章。梁启超在说史学发展的时候,举出刘知幾、郑樵、章学诚,金的书没有把郑樵看得那么重,但还是把刘知幾和章学诚列为专章。从全书的结构上看,金毓黼就是在梁启超的蓝图上填写了史书的目录,有时对这些书做了简单介绍和评论。这部书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①

随着中国史学史的逐渐成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家及其史著也日益受到关注,并因此诞育出诸如朱希祖《萧梁旧史考》、郑鹤声《汉隋间之史学》、李正奋《魏书源流考》、郭维新《干宝著述考》、蒙文通《魏晋南北朝史学》之类的专题论文^②,以及魏应麒《中国史学史》第三章“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史学”、金毓黼同名书第四章“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等综述性文字。但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非但数量稀少,且其所述不无可商之处。即便是在同类著述中堪称翘楚的金毓黼《中国史学史》,也同样颇多缺憾:

金氏的中国史学史,共分十章,……这是金氏在大学的讲义,创稿于民国二十七年,……是书尚称详尽,……也较具史学史的形式。惟金氏所揭出之中国史学的精义有限,琳琅于目者,尽是史家与史籍之名,无怪有人批评说:“吾人犹觉美中不足者,自宜论其体裁之得失,编次之良否,态度之偏正,考订之精粗,俾读者了然于二千年来史学演变之大势,及今后改良之途径。作者过重故实,而忽略史学,仅言纂修经过,鲜及体例得失,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这应是极中肯的批评。加以金氏谈史学,不参以他学,专求之史籍,开始即于经史的关系,毫无论述,渊源既迷,以后的发展线索,便难找寻。汉魏以降,迄乎宋明,思想的影响史学,也概置不问。无怪其书的浮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② 朱希祖:《萧梁旧史考》,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郑鹤声:《汉隋间之史学》,《学衡》第33—36期(1924年9—12月);李正奋:《魏书源流考》,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2卷第2号(1929年12月);郭维新:《干宝著述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10卷第6号(1936年11月);蒙文通:《魏晋南北朝史学》,《国论月刊》复刊第2卷第16、17合刊(1941年8月)。

泛而不能深入了。^①

然而,民国38年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尽管在总体上偏重于考订史料、研究个别史家及其史著,却也不乏诸如陈寅恪《读〈洛阳伽蓝记〉书后》、周一良《魏收之史学》之类的解释、疏通之作。尤其是刘咸炘先生所作的《三国志知意》与《史学述林》,更是胜义纷披,其诸多论断,例如“承祚诚善叙事,然其佳乃在于遣词而非在去取”,又如“荀书(荀悦《汉纪》)为断代编年之祖,……其论多是子家之嘉言,而非史家之要义”,^②皆发前人之所未发,即便时至今日,仍振聋发聩。

二

自1950年之后的20余年间,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的中心虽因新亚书院的创办和诸如钱穆《袁宏政论与史学》、吕谦举《两晋六朝的史学》等文的刊发^③,而从内地转移至香港,但香港作为研究中心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它对台湾学界形成了较强的辐射效应,甚而为台湾培育出不少像逯耀东这样后来以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家学者。正是在香港学界的带动下,同时也得益于李宗侗、沈刚伯、宋晞、蓝文徵诸先生的勉力经营,台湾学界不但涌现出诸如成功大学、中兴大学之类的众多新设教育研究机构和以阮芝生、雷家骥为代表的硕博士研究群体,而且学术研讨活动频繁、相关研究成果显著,从而至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取代香港,成为新的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中心。

在所有涉足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台湾学者中,逯耀东先生无疑是著述最丰的那位。从1970年在香港《中国学人》杂志发表《魏晋杂传与中正品状的关系》,到1997年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发表《司马

① 杜维运:《近六十年之中国史学史研究》,载前揭《听涛集》,第276—277页。杜先生此论,前半部分取自齐思和先生对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的评语,后半部分取自牟润孙先生的《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

② 《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黄曙辉编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549页。

③ 钱穆:《袁宏政论与史学》,香港《民主评论》第6卷第22期(1955年11月);吕谦举《两晋六朝的史学》,香港《人生》第263期(1961年10月)。两文后皆被收录于杜维运、黄进兴所编的《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台湾华世出版社1976年版,第288—303、348—361页。

光《通鉴考异》与裴松之《三国志注》》，近30年间计有16篇论文见诸港台两地的各类期刊和论文集。^① 逯先生的此类论述，以问世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别传、志异小说、史注和史学评论等一系列非儒家价值体系的新史学写作形式为考察对象，探究该期史学发展的思想基础、时代背景、特质与意义。其诸多论断，例如“《汉书·艺文志》不另立史部，和史学著作篇帙的多寡无关”^②，实发前人之未发；其“小中见大”^③的研究思路和论证方式，更深刻地影响了众多台湾学者尤其是逯门弟子的治学取径，诸如蔡瑄瑾对河东裴氏家族史学的探讨，李兴宁对魏晋别传的研究，陈识仁对北魏史学的考察，于志挺对《三国志注》的梳理，莫不建立在逯氏既有考述成果的基础上。^④ 然而，尽管逯氏对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的研讨，确曾“兼顾到个人因素、社会环境、文化互动等层面”^⑤，却不但存在着“重南轻北”^⑥等缺憾，且其系统性较诸雷家骥的《中古史学观念史》，似有未逮。

据说颇受李宗侗《中国史学史》及其《史学概要》、许冠三《史学与史学方法》及其《刘知幾的实录史学》等既有论著之影响的《中古史学观念

① 此据《逯耀东教授著作目录》统计而成，详参黄清连所编的《结网编》，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1—7页。这些论文，后来大多结集于《魏晋史学及其他》《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两书之中。

② 逯耀东：《〈隋书·经籍志·史部〉形成的历程》，载氏著《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台湾东大图书公司2000年版，第32页。经逯先生（1932—2006）生前同意、东大图书公司授权，中华书局于2006年发行了该书的简体字版。

③ 胡宝国：《读〈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书城》2006年第7期，第86—87页。

④ 蔡瑄瑾：《裴松之家学传承及六朝史学的演变》，1995年台湾大学硕士论文；李兴宁：《魏晋时期别传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陈识仁：《〈水经注〉与北魏史学》，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于志挺：《裴松之〈三国志注〉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

⑤ 李广健：《九十年代台湾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概况》，日本中国史学会《中国史学》第11卷（2001年10月），第59—60页。

⑥ 杨惠如：《评介逯耀东著〈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台湾大学《史耘》第7期（2001年7月），第163—172页。

史》^①，由16篇论文经“修改删补，融冶以成”^②。该书虽因未曾全面考察中古史学发展诸面相而“略嫌偏狭”^③，却不但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汉唐之际主流史学观念的变迁及其对彼时史学演进的影响，更在不经意间为史学史研究开辟了新路径。这其中的第六至十章，着重评述了正统论、“正史理念”、官修国史制度、“以史制君”意识的演变及其对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学发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其诸多论断尤其是该书第八章有关“以史制君”的论述至为精辟，也无怪乎为杜维运《魏晋南北朝的衰乱与史学的极盛》、罗运治《魏晋南北朝史学蓬勃发展因素的探讨》等文所参取^④。但与此同时，雷氏此书虽剖析入微且新见迭出，却也不乏略显草率的推论，其典型实例，便是据何之元《梁典序》“若夫猥狁孔炽，鲠我中原，始自一君，终为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为北魏，既分之后高氏所辅为东魏，宇文所挟为西魏，所以相分别也”^⑤云云，断言《梁典》不但具有调和南北、两认正统之意向，且“其观念实为影响隋唐两认正统的关键”^⑥。

至如杜维运所著的《中国史学史》(第二册)，虽号称取材宏富、体大思精，但细究其实，该书对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的梳理(第八至十章)，却至少存在两点不足：第一，其精义实已见诸杜氏先前所著的《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如第八章第二节“史学的极盛”、第九章“史学方法的创新与史学范围的扩大”、第十章第一节“正统的史学思想出现”等章节的内容，与《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中的“史学著述的材料”“史学著述的范围”“史学著

① 吴明勇：《评介雷家骥著〈中古史学观念史〉》，台湾《文藻学报》第16期(2002年)，第331—345页。

② 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11页。雷氏此书在大陆虽不常见，但其部分精义曾被书目文献出版社选编成《两汉至唐初的历史观念与意识》而广为流传。2011年9月，该书又被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选入“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辑刊”而得以再度排版印行。

③ 宋德熹、甘怀真、沈明得编著：《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1945—2000》第三册《秦汉至隋唐史》，台湾“国家科学委员会”，2004年，第213页。

④ 杜维运：《魏晋南北朝的衰乱与史学的极盛》，台湾《“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1期(1996年12月)，第60页；罗运治：《魏晋南北朝史学蓬勃发展因素的探讨》，台湾《淡江史学》第10期(2000年6月)，第59—60页。

⑤ 《陈书》卷34《文学·何之元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67—468页。

⑥ 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第536页、第583页注37。

述的精神境界”颇相雷同；第二，该书虽服膺于《中古史学观念史》的部分论断，但在引用时，却与雷氏原意颇相违忤，此则伍少侠的书评已有所指陈：

雷书第八章的标题为“‘以史制君’与反制：及其对南北朝官修制度的影响”，而杜书的第八章第三节的第三、第四次目分别为“以史惩戒的观念盛行”、“以史制君与君主的提倡”，……杜书在此部分的内容以“以史制君”为论述主轴，视“史祸”为一过渡现象，国君终因体会到“历史的尊贵与威严”而尊重史家与史学，……而雷书则是将“以史制君”的史官、史家们与那一群了解“以史制君”意识而想要加以反控制的国君们视为两个对立而又相互影响的力量，……则杜先生在接受雷先生的理论之余，仍对原有之理念无法割舍，以致其书之第八章读来觉得项目虽则分明，但理路似尚待釐清。^①

平情而论，杜氏此书作为后出的史学史专著，不但未能全面汲取此前研究成果的精华，且其理论的深刻性和论证的精密化，较诸《中古史学观念史》，皆有所不及。

总体而言，台湾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尽管其内容几乎涵盖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却不但存在着研究对象过于集中的弊病，而且比较明显地呈现出重论文轻著作的取向。此种取向，大抵就是当代台湾学界领袖杜维运极力倡导的产物。杜先生早在1976年9月为《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作序时就曾认定：

洋洋巨观之一部专书，往往不如一篇论文更富学术性。专书每流于驳杂，为字数而拼凑材料；论文则专精，能道前人所未道。如金毓黻之《释记注》、《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二文，较其在《中国史学史》中所谈及之记注之法与唐宋设馆修史始末，实更为详密精确也。李宗侗先生之专文《史官制度——附论对传统之尊重》，亦较其专书理想。专篇论文之撰写，或奠基于作者数年、数十年之归纳材

① 伍少侠：《简评雷著〈中古史学观念史〉与杜著〈中国史学史（第二册）〉中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论述》，台湾《中正历史学刊》第7期（2004年），第219—236页。

料,功力所至,精见自出。^①

杜氏此说洵为的论,但令人遗憾的是,近40年来台湾学界不仅依然充斥着诸如《〈魏书·释老志〉释部撰述原因研究》之类的疑似“为字数而拼凑材料”的“专书”,更不乏像《史臣与儿臣角色的摆荡——论萧子显〈南齐书〉的修撰立场》那样看似论述全面实则虚张部帙的论文。^②而在愈演愈烈的论文“书籍化”趋向日益严重地侵蚀学术创新原则的同时,随着逮耀东、雷家骥等老一代学者或荣退或治学重心他移,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队伍的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出身中文专业的学者成为该领域的主角。尽管出自中文学者之手的相关研究成果,不乏诸如游千慧《从学术交涉谈六朝史学的形成与延展》之类的佳构^③,但更多的论著,却囿于作者不同于历史专业学者的成才背景和知识结构,往往拾人牙慧而乏善可陈^④。这就不但加剧了本已隐现的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成果量质齐衰的下滑势头,更使得台湾无从继续保有相对于大陆的领先优势;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的研究中心,也因此至晚在世纪交替之际,完成了从台湾到大陆的转移。

三

大陆地区的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就其纵向演进轨迹而言,大抵可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间,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与“史以致用”的文化传统交互作用下,学术生态严重恶化;唯其如此,尽管在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各高校历史系较为普遍地开设了中

①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序》,可见杜维运、黄进兴所编的《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1册卷首,台湾华世出版社1976年版;又可见前揭《听涛集》,第271—272页。

② 阮忠仁:《〈魏书·释老志〉释部撰述原因研究》,台湾兰台出版社2010年版;陈金城:《史臣与儿臣角色的摆荡——论萧子显〈南齐书〉的修撰立场》,台湾“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41期(2009年),第365—404页。

③ 游千慧:《从学术交涉谈六朝史学的形成与延展》,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

④ 例如蔡衍廷《尊魏?拥蜀?:关于裴松之正统观的几点讨论》的核心观点,其实与卢建荣《裴松之历史评论的思想根源——兼论尊经传统的回应》别无二致。两文分见台湾《东华“中国文学研究”》第4期(2006年9月)、《劳贞一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史学史课程,而且学界亦尝就其历史分期、发展规律、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又热烈的讨论,但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却并未因此走出其停滞不前的困境。

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既是改革开放事业的起点,也使得大陆学者的研究工作真正步入正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史学史研究室对《中国史学史论集》的选编^①,以及朱仲玉《魏晋南北朝时期史籍散论》、黎子耀《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两文的发表^②,大抵可被视为此一转变的界标。自兹以降,迄乎20世纪90年代末,大陆学界的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可谓风起云涌,不但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等新出著作皆设专章详加论述,而且问世了诸如施丁《从〈隋书·经籍志〉看汉隋间历史撰述的发展》之类的众多专题论文,并由此形成三大热点:(1)在充分肯定其历史地位的前提下,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探析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兴盛背景与发展特征,顾相奎《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探源》和高敏《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兴盛及其特征和原因》^③,就是这类宏观探讨的翘楚,而丁鼎先生更由此进一步考察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对唐代史学的深远影响^④;(2)主要围绕史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从历史编纂学角度考察魏晋南北朝史学诸面相:或如柳维本勉力勾勒隋唐以前中国史官制度的沿革^⑤,或如刘隆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一),其实在1979年元旦之前就已完成编选,内收5篇与魏晋南北朝史学有关的论文:陈直《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束世澂《范曄与〈后汉书〉》、缪钺《陈寿与〈三国志〉》、杨翼骧《裴松之与〈三国志注〉》、曹尔琴《酈道元和〈水经注〉》。

② 朱仲玉:《魏晋南北朝时期史籍散论》,《史学史资料》1979年第4期,第2—7页;黎子耀:《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第67—72页。

③ 顾相奎:《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探源》,《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2期,第100—106页;高敏:《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兴盛及其特征和原因》,《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55—61页。与诸多学人的此种理解截然相反的是,黎敏、胡巧利在其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S2期的《繁杂≠繁荣——论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繁杂及其原因》中,转而认定此期史学貌似“繁荣”实则“繁杂”。

④ 丁鼎:《略论魏晋南北朝史学对唐代史学的影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第42—48页。

⑤ 柳维本:《隋唐以前中国史官设置与沿革述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第67—72页。